

一、开 端

提要与按语

《公车上书》是在帝制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自发的、大规模的参政议政活动，也开辟了近现代知识分子以集体签名的“万言书”的方式发表政见的先河。其核心思想是要借甲午战败之际，鼓吹变法与改良，对西方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其中包括引进西方的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制度。这里的片断是选自《上书》中“教民”与“开智”部分。现代教育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康有为等当时的举人们发现，“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而获得才智之民唯开书院、办学堂一途。没有《公车上书》和后来的戊戌变法，就很难想象会在一八九八年设立京师大学堂，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也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上书》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痕迹，如视知识分子为供帝王御使的“人材”，视“教民”为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格格不入。

现在人们很少把康有为与北京大学联系起来，但南海先生无疑是北大的催产婆。他在《请开学校折》中，明确地向光绪进言：“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可见，北大生来就是对外开放的场所，学习先进文明和先进思想的窗口。康氏虽很少被归入自由主义的阵营，但他

在早年开放派和改革派却是千真万确的。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蔡元培、胡适，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第一代的改良主义者到后来十足的自由主义者的鲜明轨迹，而他们恰恰济济于北大一堂。没有康氏的改良主义远源，就没有后来的自由主义长流。

公车上书

（节录“教民”、“开智”部分）

康有为等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亦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营。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放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复裨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船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

姚燠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请废武科，近年词臣藩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州县艺学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各作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

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

（一八九五年）

请开学校折

康有为

奏为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以狂愚，请废八股，荷蒙圣明嘉纳，立下明诏施行，薄海回风，洗濯固陋，咸更新厉学，以赞休明。夫以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扫除之，非皇上之神武英断，何能致此？岂愚臣之梦寐寤思所能及也。天下回首面内，想望更化之善治，肇应千载之昌期，在我皇上矣。其鼓荡国民，振厉维新，精神至大，岂止区区科举一事已哉？虽然，譬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疴，即宜急补养以培其中气，则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

吾国周时，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之等，乡有党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籥、言说、射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言文王于人才作而致之，非赖自然生而有之也。故免置野人，可为干城腹心，介冑武夫，能说诗书礼乐，人才既多，则国命延洪，故作人则能寿考也。后世不立学校，但设科举，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鲜少，不周于用也。臣不引远古，请近校于今欧、美各国，而知其故矣。

欧、美之作其国民为人才也，当吾明世，乃始立学，仅从

僧侶，但教貴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窩多于其生蘇詩宮而師之，聘柏羅斯其于瑞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兼各國文，務為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听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為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為師，皆效法焉。

英大學分文、史、算、印度學、阿喇伯學、遠東學，于哲學中別自為科。美則加農工商于大學，日本從之。夫學至于專門止矣，其所謂大學者，不過合各專門之高等學多數為之，大聚天下之書圖儀器，以博其見聞，廣延各國之鴻博碩學專門名家，以得其指導，而群一國之學者，優游漸漬，讲求激厲，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備此者，皆可謂為大學，非徒在國都而已。總而言之，小學中學者，教所以為國民，以為己國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學也。高等專門學者，教人民之應用，以為執業者也。大學者，猶高等學也，磨之礱之，精之深之，以為長為師，為士大夫者也。其條理至詳，科學至繁，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以蕞爾國而能獨立者，以諸學并立，大學岿然，人才不可勝用故也。普勝法后，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于學，作而成之故也。彼分途教成國民之才，如此其繁詳也，我乃鞭一國之民以從事于八股枯困搭截之題，斷人才而絕之，故以萬里之大國，四万万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國也。

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盖先未尝教养以作成之，天下岂有石田而能庆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见矣，不可不亟设学以育成之矣。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惟圣明留意幸察，伏乞皇上圣鉴。谨矣。

（一八九八年）

二、自由主义与 近代中国

提要与按语

近现代中国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若不考虑以强力为后盾的支持，自由主义也许是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先驱，至今仍享有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尊敬；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又在现实的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上落实得最少。本书所选的许多文献表明，他们在五十年以前的主张，至今看来仍然正确；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今天才刚刚开始落实，或尚未得到落实；在议政的能力、勇气方面甚至有所倒退。而那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不腼腆于公开自己的价值信仰、政治立场与主张。办报刊、结社团、张宣言、发通电等是以北大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政治主张》正是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笔，集合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政治宣言。该宣言一方面对政府“要有正当的机关加以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则应“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依据自由主义的立场，作者们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和‘一个公开的政府’”。

《少年中国说》指出，中国的老大腐朽，在于国家被朝廷

所窃取，而朝廷不过是“一家之私产”。只有扭转这种局面才能化老迈中国之腐朽为少年中国之神奇。在曾经参与筹建北大的梁启超先生看来，少年中国异于老迈中国的根本之处在于少年中国是“人民之公产”。天下不成为公产，中国不可能重获青春。

梁启超在《论进步》中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与衰老，根本的原因在于“大一统而竞争绝也”，公开的、自由的、依据正当的游戏规则的文明政治竞争旷古未闻，政治竞争的方式只限于两种：或是宫廷阴谋、官场黑厚；或是刀戟相交、血流漂杵。任公先生指出，长期的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学术的禁锢造成了思想窒息。禁锢进步的法门是取缔学术自由，因此，实现进步须以学术思想的自由与繁荣为突破口。

曾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在《社会的信条》中指出：“信条的一类物，须是应社会上的需要，出于自然。若遵守矫揉造作、不合时宜的信条，就有如地狱的苦痛”。经历反右、文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和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大概最能体验违反人性、凭空臆造的信条能产生多大的苦痛。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它强调任何政治信条必须尊重人性、尊重现实，否则，乌托邦式的善良愿望会铺成通向地狱的桥梁。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则暴露中国自由主义者固有的缺陷：在正宗的、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以罗斯福为代表的、变种的新自由主义之间，以英国革命和柏克为代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以法国革命和卢梭为代表的唯理的自由主义之间不能作出明确的区分。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仍有其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中

的“新”部分却隐含着反自由主义的倾向。该文中所歌颂的自由主义的新成分正是被哈耶克差不多在同时斥之为“通向奴役之路”的货色，而作者对其毫无所知。当然，尽管受到了“新”自由主义中非自由主义成分的诱惑，但并未彻底丧失其自由主义立场，作者明白：“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

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也出现了类似傅斯年在《社会的信条》中的主张（当然李的文章发表在前）：自由的政治须以民彝为本，“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长，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在该文中，作者从自由主义的责任伦理出发，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治道：“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与众共由。”易言之，高调理想是治国之大忌。作者发现，长期支配我国治国者们的却是韦伯所称的“意图伦理”，“己所好者，而欲人之同好，己所恶者，而欲人之同恶。有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所以，现代的统治者应该知道，“此一身之好恶非通于社会之好恶也，此一身之有无，非通于社会之有无也”。作者进一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但求其同，不容其异，专制之源而立宪之反，其结果必至法网日密，民命日残。”这样的法律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其违背民彝、扭曲人性。作者正确地发现，民彝和法律良性结合的正面典范是英国的宪政。作者以无比赞赏的口吻写到：“英伦宪法之美，世称世界之最”，因为该国的宪法顺应民彝，“匪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特也；非空玄理论之果，乃英人固有本能之果也。”而合乎民彝的现代政治即是实行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此中政治是“国法与民彝

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且“以经久之经验，遂保有绝美之精神焉。”

在《政坛演说会之必要》，作者从政治公开与言论自由的角度提出了现代政治与旧的政治的重大区别，即是“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专制政治下“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也不会有慷慨陈词的政治演讲会，于是，“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见”。而相比之下，“文明国之政争，且在演讲台上。”中国要学做文明国家，改行公开的立宪政治，允许民众畅所欲言的“政坛演说会”必不可少。

长期执教于北大的胡适先生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专门论述自由主义的文字却并不多见。所以，《自由主义》应颇具代表意义。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而且是消极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而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其次是民主，“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东西风交相压倒的政治则是“摧残自由”的政治。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在本文中，作者“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是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

不能容忍自由的思想 and 言论”。作者把自由主义的意义总结为四个方面：“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变革。”而蔡元培先生所强调的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体现的正是上述的自由主义第三条原则。

丁文江在《我的信仰》中呼应了自由主义对宽容的强调，否则，若“要永久独裁，不但必须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产生”，要消灭其于萌芽状态之中，“所以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政治下作首领的腐化与‘盲化’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的政治主张

蔡元培 胡适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